

文缘：☁

我和文坛百家

陈 辽 著

香港作家出版社

文缘：我和文坛百家

陈 辽 著

香港作家出版社

书 名 文缘:我和文坛百家
著 者 陈 辽
责任编辑 潘梦圆
责任校对 李秀萍
出版发行 香港作家出版社(香港骆克道 88 号 5 楼)
印 刷 南京文博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76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62-8115-19-7
定 价 100.00 元(港币、人民币)

香港作家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我于1945年8·15前参加新四军;1946年1月,在《江海导报》上发表第一篇文艺作品,从此进入中国文坛,至今已有六十一年。

在这六十一年中,我有幸在1957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于1960年亲聆周总理的即席讲话,和陈毅元帅当面交谈;于1979年见到邓小平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系统研究邓小平的文艺思想。

我在1962年与郭老(沫若)就《娄山关》一词的理解问题进行争鸣,结果是郭老“错了”,他并未著文反驳我的意见。我为活着的叶老(圣陶)写了《叶圣陶评传》,这是新时期出版的为健在的作家撰著的第一部评传(新中国成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为活着的作家写传记)。我与世界文化名人盛成结识,写了多篇关于盛成的文章,而盛成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他和周恩来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是法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写的《我的母亲》一书,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印百万册以上,这一记录,我国现代作家未能打破;他晚年归国,我与他结识,曾交谈多次。我为胡风写了《胡风文艺思想平议》,30000字,因该文为胡风文艺思想公平评议,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是看到胡风的江苏最后一位评论者。我写了《周扬论》等多篇论述周扬文艺思想的文章。我和著名剧作家陈白尘、著名小说家、戏剧研究家陈瘦竹、著名小说家任何(施子阳)、《红日》的作者吴强、《南京的陷落》的作者周而复、《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都有过交往。

在当代知名作家、文艺家中，我与马烽、艾煊、李进、闻捷、王火、石言、顾尔鐔、沙白、赵沛、高莽、忆明珠、李克因、鲍明路、王昊、陆文夫、高晓声、黎汝清、王扶林、枫亚、方之、鲍昌、李国文、凤章、李士非、高燮初、刘振华、丁家桐、李国涛、王立道、杨旭、宋词、从维熙、张弦、庞瑞垠、金坚范、杨守松、刘斯奋、唐浩明、余秋雨、赵本夫、王川、周梅森等人相识，对他们的作品都曾作过研究，写过评论文章。

我是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者。我把文学看作是一个整体，因此，从《诗经》开始的古代文学、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文学、“五四”前后的现代文学、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当代文学，我都作过研究和评论。由此，我与老一辈学者、专家、理论家刘蕙孙、吴天石、吴奔星、林默涵、吴调公、王元化等人打过交道，或与之作过思想交锋（与林默涵）；与同辈文学研究家、评论家唐达成、周勋初、顾骧、阎纲、刘锡诚、董健、李元洛、刘登翰、陈贤茂等人是老朋友，多有交往；和比我年轻的蔡子谔、沈伯俊，彼此间也很熟谏。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之被介绍、引进到大陆，我又开始对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进行评论和研究，与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曾敏之、魏子云、王尚政、余光中、梅节、张拓芜、张默、犁青、郭枫、陈映真、锺毓材、黄春明、张汉基、李远荣、陈娟、刘济昆、陈益源、林中英、戴小华、冰凌、罗自平等人有过交往，写过评论他们及其作品的文章。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扩大文化交流，我又曾和德国的汉斯·迈尔、日本的尾崎秀树、森山隆、韩国的朴在渊等学者、作家有所接触和交往，并撰写过有关他们的文章。

总起来说，六十一年来，我与之接触过的作家、学者、专家、评论家不下一千人；相知较深的在一百人以上，这是文缘。

我出生于1931年，今年七十六岁。回顾我进入文坛后的六十一年，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多少在我身上有所折射；我国的文学

成就,在我相识、相知的友人中,有所表现;我国文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及其缺失,也在我认知的作家作品中有所观照。因此,我从2005年起,决定写《文缘:我和文坛百家》这本书,企图通过我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及中国文坛百家的文缘,反映出中国文坛的风雨,中国文学的成就,中国文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为中国文坛六十一年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我写的都是历史的真实。每篇文章,每一段落,每一句子,每一字词,都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但在我对其人其作其言其行记叙的基础上所作的评价,可能有不符合实际之处,可能有片面性。对此,由我个人负责,并由衷地、诚挚地接受作家和读者的批评。

《文缘:我和文坛百家》共分五组:第一组为我和党与国家领导人;第二组为我和作家;第三组为我和专家、学者、评论家;第四组为我和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第五组为我和外国作家和学者;共一百篇。文章的排列次序基本上以所写对象年龄大小为序,不存在谁的知名度高就把谁排在前面的问题。由于写作的对象不同,文章的重点不同,因此《文缘:我和文坛百家》的各篇文章并无定式,篇幅有长有短,字数也有多有少,但并不意味着篇幅长的、字数多的,我对该作家的评价就一定高于其他作家。有的作家,我对他(她)很敬重,评价也颇高,但因我和他(她)的交往少了一些,只能写这么多文字。这是要请被写的作家和读者们理解和谅解的。

在行文中,我都直呼所写对象的名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们都可以直呼其名,为什么不可以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家、学者、专家直呼其名呢?

目 录

前 言

一、我和毛泽东	(1)
二、我和周恩来	(6)
三、我和邓小平	(12)
四、我和陈毅	(20)
五、我和郭沫若	(24)
六、我和叶圣陶	(30)
七、我和盛成	(36)
八、我和胡风	(41)
九、我和周扬	(46)
十、我和陈白尘	(51)
十一、我和陈瘦竹	(55)
十二、我和施子阳	(60)
十三、我和吴强	(66)
十四、我和周而复	(70)
十五、我和李英儒	(74)
十六、我和马烽	(79)
十七、我和艾煊	(87)
十八、我和李进	(93)
十九、我和闻捷	(99)
二十、我和王火	(103)

二十一、我和石言	(109)
二十二、我和顾尔譚	(113)
二十三、我和沙白	(119)
二十四、我和赵沛	(122)
二十五、我和高莽	(127)
二十六、我和忆明珠	(132)
二十七、我和李克因	(135)
二十八、我和鲍明路	(139)
二十九、我和王昊	(144)
三十、我和陆文夫	(149)
三十一、我和高晓声	(153)
三十二、我和黎汝清	(158)
三十三、我和牧惠	(162)
三十四、我和王扶林	(167)
三十五、我和枫亚	(172)
三十六、我和方之	(176)
三十七、我和鲍昌	(182)
三十八、我和李国文	(184)
三十九、我和凤章	(189)
四十、我和李士非	(193)
四十一、我和高燮初	(195)
四十二、我和刘振华	(200)
四十三、我和丁家桐	(204)
四十四、我和李国涛	(206)
四十五、我和王立道	(210)
四十六、我和杨旭	(218)
四十七、我和宋词	(222)
四十八、我和从维熙	(225)

四十九、我和张弦	(233)
五十、我和庞瑞垠	(238)
五十一、我和金坚范	(242)
五十二、我和杨守松	(248)
五十三、我和刘斯奋	(254)
五十四、我和唐浩明	(257)
五十五、我和余秋雨	(263)
五十六、我和赵本夫	(267)
五十七、我和王川	(274)
五十八、我和周梅森	(279)
五十九、我和刘蕙孙	(283)
六十、我和吴天石	(288)
六十一、我和吴奔星	(294)
六十二、我和林默涵	(298)
六十三、我和吴调公	(303)
六十四、我和王元化	(309)
六十五、我和唐达成	(315)
六十六、我和周勋初	(320)
六十七、我和顾骧	(324)
六十八、我和阎纲	(329)
六十九、我和刘锡诚	(332)
七十、我和董健	(336)
七十一、我和李元洛	(341)
七十二、我和刘登翰	(345)
七十三、我和陈贤茂	(349)
七十四、我和蔡子骥	(353)
七十五、我和沈伯俊	(357)
七十六、我和曾敏之	(362)

七十七、我和魏子云	(365)
七十八、我和王尚政	(369)
七十九、我和余光中	(373)
八十、我和梅节	(379)
八十一、我和张拓芜	(382)
八十二、我和张默	(386)
八十三、我和犁青	(390)
八十四、我和郭枫	(395)
八十五、我和陈映真	(400)
八十六、我和锺毓材	(405)
八十七、我和黄春明	(410)
八十八、我和张汉基	(413)
八十九、我和李远荣	(417)
九十、我和陈娟	(421)
九十一、我和刘济昆	(425)
九十二、我和陈益源	(430)
九十三、我和林中英	(434)
九十四、我和戴小华	(436)
九十五、我和冰凌	(439)
九十六、我和罗自平	(444)
九十七、我和汉斯·迈尔	(449)
九十八、我和尾崎秀树	(456)
九十九、我和森山隆	(459)
一百、我和朴在渊	(463)

一、我和毛泽东

我一生未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我一篇文章的好评，却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合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那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速成中学（属六十军管辖，驻地在南京浦口北边的花旗营）任大尉政治教员。我阅读了该文后，知道陈其通、陈亚丁是总政治部文化局副局长，但却认为他们在具体地估计“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工作状况的时候，得出了一系列不符合实际的、含有悲观怀疑态度的结论。于是写了《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一文与之商榷。

陈其通等同志对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年后的文艺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这就是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的状况描画出来的一幅图画。“糟得很！”这就是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实际的总估计。

我在《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一文中摆事实，讲道理，对这些错误观点一一加以反驳。没有想到，文章寄出后，1957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

更没有想到的，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阅读了这篇文章，予以好评。他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肯定的语气提到了我这篇文章，还问：陈辽是什么人啊？信息灵通的周扬当即回答：陈辽是解放军里的一个文化教员，年轻人。（按：周扬说我是解放军里的一个教员，对的；但我当时不是文化教员，而是政治教员。）毛主席接着说：这个小家伙，不简单啊！（按：毛泽东与周扬之间的问答，我是从六十军刘政委后来与我的谈话中得知的。）毛泽东之所以在那次会议上肯定我那篇文章，因为他那时正号召整风，批评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在毛泽东对我的文章作了肯定后，《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10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说他们“这种（对目前文艺工作的）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的歪曲。关于这一点，在本报三月一日陈辽同志的文章、三月十八日茅盾先生的文章和四月四日本报第七版所辑录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中，都已经指出了。”《人民日报》社论对我的提名表扬，使我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其时，我还不到二十六周岁。

《人民日报》4月10日社论发表后，六十军刘政委打来电话，请我去军部，说要和我见面，谈谈。我应约到了刘政委的办公室。

他对我热情接待,询问了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什么时候开始搞文艺评论,以及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刘政委很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对我文章的肯定,毛主席与周扬之间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问答情况,最后说,六十军出了你这样一个人才,我们很高兴。希望你今后继续在文艺评论方面作出成绩来。刘政委的传达虽然与后来公布的会议纪录略有出入,但是,我认为他的传达是比较符合实情的,那是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解放军代表的会议记录。

又是没有想到,两个月后,风云突变。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从此开展了铺天盖地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斗争中,陈其通、陈亚丁同志再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则作为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代表,在“反右”斗争中对我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批判”。单是大尉政治教员批评少将部长就成了一条罪状。本来,第22速成中学校党委要把我划成“右派”,多亏校长张启曙(他是校党委委员,但不是书记)在关键时刻为我说了话:陈辽于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政治历史清白;找不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根源,把他划成“右派”,处分太重了。经过“折中”,把我定为“中右”(准右派,在内部控制使用);留党察看两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但是,“带罪”之身的我,哪个单位接受我呢?此时,身为江苏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李进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让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鲍明路,到六十军拿取我的人事档案材料。李进看过后,说:“我看陈辽没有什么大问题,文联要!”这样,我从人民解放军第22速成中学转业到了省文联,在省作家协会当秘书,分管理论批评工作。

1961年,贯彻“文艺十条”;1962年,贯彻“文艺八条”,文艺形势有所好转。1962年1月,我被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任指导

员。1962年5月,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标准》一文;同年5月,我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革命的美学,美学的革命》一文。在后一篇文章中,我指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美学观点。此外,我还发表了另一些文学评论文章。随着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松绑”,我又在中国文坛上浮升。

好景不长。及至1962年9月24-27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了第一个批示;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了第二个批示;文艺领域内形势越来越严峻。“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被戴上“漏网右派、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阎王殿里黑秀才”三顶帽子遭受批斗。后到省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2月,我又被分配到一个农村中学工作,一待五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那时我正在一所公社中学里担任政治教师,听到这一噩耗后,不禁失声痛哭。不管怎么说,是毛泽东对我那篇文章的肯定才使我成名并转到文艺工作岗位的;又是毛泽东在1961、1962年对文艺问题的“松绑”,使我再次在文坛上浮升的。至于我在“反右”中受到的不公正处理,我归之于第22速成中学某些领导人对我处理过严;我在“文革”中挨批斗,被下放,我归之于林彪的篡党夺权,利用“文革”极力把中国搞乱。对毛主席,我仍然敬若神明,根本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与毛泽东有何种联系。我的政治觉悟当时还是很低的。

“四人帮”粉碎,我重新回到文艺工作岗位,我的头脑才开始急转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思想上的无形禁锢才逐渐解除。我受《雨花》主编顾尔鐔之托为江苏“探求者”的平反呼吁,写了社论《“探求”无罪,有错必纠》(《雨花》1979年第4期);对毛泽东提倡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表示怀疑,写了《“两结合”创作方法质疑》(《安徽文学》1979年9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11期转载);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写了《不能把文艺的内容等

同于政治,归结为政治》(《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在《向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将”一军》(《长江》[文艺丛刊]1981年第1期,后被《新华文摘》转载)一文中,我更批评了“只准写阶级性,不准写人性”等等庸俗社会学的系列表现;而在《胡风文艺思想平议》(《中国》文学双月刊1985年第4期,后被《新华文摘》转载)中,我更率先为胡风文艺思想辩诬,对胡风文艺思想“平反”。尽管如此,我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虽然不同意毛泽东在动机与效果、“人性论”、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把小资产阶级作家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等问题上的提法,但我仍然认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思想,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问题上的思想,关于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这一思想时常常与这一思想悖离),还是正确的,应该坚持的。为此,我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1986年10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中以整整一章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

我在中国文坛上的两起两落,都与毛泽东有关。

二、我和周恩来

我第一次听到周恩来的名字，是在 1936 年“西安事变”以后，那时，我才五周岁多。

我的父亲陈纪纲和母亲顾杏元，都是第三党党员。所谓“第三党”，全名是“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因为它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建立起来的政党，所以被称为“第三党”。该党的创始人是邓演达。邓演达的得力干部季方，江苏海门人，他便在海门知识分子中发展“第三党”党员。我的父母在加入“第三党”后，家乡灵甸镇一带“第三党”党员支部，常在我家开会。因为“第三党”是非法政党，所以支部开会时，母亲便在外头“望风”，观察动静。我因为是小孩子，他们开会时，我仍在一边看书或做功课。耳边听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这句话，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西安事变”，我并未深究，倒是“周恩来”的名字，在我头脑里留下了印象。

1945 年 8·15 前，我参加了革命，进入了新四军的行列。从此，“周恩来”三字就像“毛主席”三字一样频频在我耳际震响，但我从未见过周恩来。

1960 年 12 月 21 日，周恩来、陈毅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来到南京，日程之一是参观总统府。总统府里那时住有江苏省政协、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江苏省文联、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众多单位。听说周总理、陈毅元帅和西哈努克亲王来了，大家都自发地出来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被有关人员引导去参观总统府里各

个景点了；陈毅要去西花园游览；因此只有周总理被大家围了起来。一阵热烈掌声后，有人请周总理给我们讲话。周总理略思片刻，即席发表了几分钟的讲话，大意是：如今我国处于困难时期，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度过难关，夺取胜利。我站的位置距离周总理只有几步远，看得很清楚，周总理身穿呢大衣，精神矍铄，但因为在困难时期，脸色显得有点憔悴。在他的讲话里，带有淮安口音，但却是标准的普通话，听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周总理讲过话后，又赶到西哈努克亲王那里去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2年，我被下放到一个农村中学，任革委会副主任（无主任）。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教职员工一片哭声。这时，上面通知，不搞悼念活动。我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运用手中的权力，自动自发地在盘城中学举行了哀悼周总理的仪式：人人佩带小白花（白纸制成），肃立；奏哀乐；向周总理遗像三鞠躬；默哀；而后是我、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讲话；颇为庄严、肃穆。其后，也不曾有人追究我们为何违反规定举行悼念活动。

“四人帮”粉粹后，我“归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从1983年起，我开始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其中有《周恩来的文艺思想》专节），要点如下：

第一，在文艺的辩证法方面。

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各方面作了辩证地研究，提出了文艺工作中的辩证法问题。在1959年5月《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篇讲话中，周恩来提出，要搞好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就得解决这样一些文艺工作中的辩证法问题：一、“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二、“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三、“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四、“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五、“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六、“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七、“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八、“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九、“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